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9

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

[奥] 威尔海姆·赖希 著
张 峰 译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上海三联书店



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

著者　　吉米·詹姆斯

译者　　王春生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吉米·詹姆斯著
王春生译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9

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

[奥] 威尔海姆·赖希 著

张 峰 译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奥]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1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6084-8

I. ①法… II. ①威… ②张… III. ①群体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9509 号

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

著 者 / [奥]威尔海姆·赖希
译 者 / 张 峰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3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84-8/C·564
定 价 / 6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主 编 陈 恒 黄 镊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王旭	王晋新	王晓德
王海利	王晴佳	卢汉超	刘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强
李剑鸣	杨巨平	杨熙楠	汪民安
范景中	陈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淳	林子淳	林在勇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俞金尧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高毅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洋	彭刚	彭小瑜	韩东育
魏楚雄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

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爱情、劳动和认识是我们生活的源泉，也应该支配我们的生活。

威尔海姆·赖希

中译者序

在西方现代哲学史、心理学史和社会学史上，威尔海姆·赖希堪称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生前他屡因骇人的论断和出格的举止而遭众人非议，为世所不容。在党派方面，他先后参加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但又在党内搞一种与党的政治方针格格不入的性卫生运动，很快被驱逐出党；在民族方面，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肯定在劫难逃，但一贯恪守中立的丹麦、瑞典和挪威也因别的原因而容不得他，于是他只好几经周折客居美国；在职业上，尽管他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但他却不限于为个人看病，而扬言要治疗整个病态的人类，以致他作为精神病医生竟被怀疑本身精神就不正常，并被褫夺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会籍；在学术方面，他潜心研究数十年历经艰辛发现的“宇宙生命能”和制造出的“宇宙生命能存储器”，也被判定为一场骗局，他不仅全部心血付之东流，甚至因此断送了性命。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贵于后。”然而，赖希死后不久，20世纪60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抬出了他，把他关于社会性压抑的标志画在大学墙壁上，把他的书拿在手中挥舞，把他的话当作语录呼喊，更有甚者，他竟被奉为“西方性革命之父”。

赖希1897年诞生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富有的农场主家庭，童年生活安逸。不幸的是，他14岁时母亲自杀身亡，17岁时父亲又故去，给他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罩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1916年他作为奥地利陆军的一名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亲身体验。战争结束后他上了维也纳大学，先学法律后转而学医，192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赖希在大学毕业前就从事了精神分析学活动，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员。由于他在精神分析技术上有所创见，颇受弗洛伊德重视，二人结下了忘年

之交。据说弗洛伊德的《幻想的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两书中就采纳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赖希的观点。

赖希不是一个纯学术研究者,他总想从事他所说的“性政治”实践。1927年他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久,就创办了“社会主义性卫生和性学研究会”,并出资在维也纳工人区建立了六个性卫生诊所,据他讲,研究会和性卫生诊所吸引了不少群众,曾有数千人蜂拥而来听讲或就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认为赖希的这些活动干扰了该党的政治和经济活动,遂于1930年关闭了赖希的性卫生诊所。随后赖希便移居德国柏林,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赖希雄心未泯,又在德国创建了一个为群众寻求性解放的协会,到1932年会员已发展到4万人。德国共产党出于当时政治状况的考虑,对赖希的性卫生运动深感不安,不仅于1933年2月开除了赖希的党籍,而且还查禁了赖希的“性政治出版社”的书籍。与此同时,赖希在精神分析学界的声望也急剧下跌。为了避免因赖希而招致的麻烦,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分别于1933年和1934年开除了赖希的会籍。再加上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赖希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地位。

从1934年开始,赖希先后移居丹麦、瑞典和挪威,均因受到无端的猜忌、敌视和攻击而无法久留,遂于1939年5月定居美国。在美国赖希先是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校任医药心理学副教授,然后在缅因创立了自己的私人研究所,继续从事他所说的“宇宙生命能”(orgone energy)研究。“宇宙生命能”是赖希声称他在1936年到1940年间发现的一种在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原始能量,这种能量是可以看见、可以应用的,用验电器或盖格尔计算器可以测定出来。然而,赖希的这一发现始终没有被其他科学家所证实,难怪他在本书中叹息道:“在宇宙生命能实验研究中,我一直奇怪,几万个杰出的学者居然完全忽视了大气的宇宙生命能。”赖希把这种“宇宙生命能”说成是宇宙中一切生命物存在的基础,但这种“宇宙生命能”究竟是什么,他本人也说不清,它像是生物电能,可又不是电能。照他的说法,“宇宙生命能,即宇宙中特殊的生物能量,不是机

械地起作用的，它不是神秘的。这种宇宙生命能有着**自身特有的机能**规律，这些规律不能物质地、机械地或僵化地来理解，也不能按正负电流的概念来理解”。究竟如何来理解，人们无从得知。然而，赖希却声称他根据自己的这个发现而造出了“宇宙生命能存储器”，该仪器可以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一切人类疾病，并将该仪器租给病人使用。1954年3月，美国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判定赖希的这种仪器是骗人装置，法院下令全部销毁。赖希先是服从法院禁令，而后又反供，结果被法院以不服从政府禁令罪判处两年徒刑。1957年11月3日赖希在服刑后不久即病逝于刘易士堡联邦监狱的精神病区。

《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是赖希的一部重要著作，德文第一版于1933年9月在德国出版，紧接着在1934年4月在丹麦出了第二版。该书问世后，遭到了各方政治势力的抵制，1935年德国盖世太保颁布法令查禁此书，与此同时丹麦和挪威共产党也指责该书是“反革命的”。各方政治势力的反对使赖希对政治极其厌恶，遂于1942年8月在缅因发行该书第三修订增补版时，尽力删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些提法，并增加了对各方政治势力的抨击之词。1946年该书英文第一版问世，1970年英文新版印行，此后又分别于1972年、1975年、1978年、1983年多次重印。

顾名思义，《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是研究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的。但赖希绝不限于此，实际上他是以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为话题展示他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以及生物物理学上的全部学说，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理一下赖希思想的头绪，并对赖希在本书中频繁使用的一些自撰术语略加解释。

赖希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尽管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带有限制词的，但他毕竟自认是马克思思想的后继者。他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并认为他的许多思想得益于马克思的启示。例如，他主张对社会的研究不应限于经济过程，还应研究意识形态及

其他各种关系。他认为他的这一主张是受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一段话的启发，这段话说：“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

然而，赖希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确定不移的理论，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 19 世纪社会条件的产物，在 20 世纪它的许多内容已显得陈旧和过时。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不正确的，因为性格结构没有阶级之分，只有“反动的”和“革命的”之分。再如，他说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仅限于体力劳动者，而把其他劳动者叫作“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这也不符合 20 世纪的社会结构。

总的说来，赖希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多于否定，他极力反对的是他所说的当代“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阉割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蜕变为空洞的公式，失去了科学的革命潜力。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决定论，即认为意识形态是唯一地由经济存在决定的，而看不到经济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发展的依赖性，并把心理学当作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排斥出去。因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讨论危机时期客观的社会经济过程，忽略了对大众心理的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使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破了产。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原以为 1929 年到 1933 年的经济危机会使大众的意识形态向左转，但实际上却是转向了右的极端，绝大多数群众恰恰是在社会革命的经济前提已经具备时投票支持了法西斯主义右翼政党。从这一事实中赖希得出结论说，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是相离异而不是相一致的；就现实政治而言，决定性的不是经济分布，而是意识形态分布。

由此，赖希向自己提出了考察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任务。他承认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的东西转化为精神的东西的论断是正确的，但又认为这种论断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 物质的东西如何转化为意识的东西，在转化

过程中人的头脑里发生了什么变化？（2）意识是如何反作用于经济过程的。他认为，只有性格分析的心理学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过程，而且还把这种经济过程深植于人的心理结构中。如果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它也就成了人身上的一种物质力量，从而对经济过程发生反作用。一般说来，心理结构落后于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事件的急剧变化，由此造成了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不相一致的非理性现象，社会经济学只能说明思想和行动与经济状况相一致的合理性现象，而这种非理性现象则要由大众心理学来说明。

赖希把自己的理论以及由这种理论引发的运动叫做“性经济”（sex-economy）。性经济是关于个人性能量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调节自身生物能的方式，如个人抑制生物能的程度和在性高潮时释放生物能的程度。决定这种调节方式的因素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心理和生物的因素。因此赖希强调把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并将这二者视为他的性经济社会学的前提或基础。他说：“性经济社会学诞生于把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努力之中”。（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

至于性经济同大众心理学、性社会学、性卫生学的关系，实则是同一回事。用赖希的话说，“自然而然，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学基础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基础上的性经济社会学的科学，同时本质上是一种大众心理学的和性社会学的科学”。

赖希依据他的性经济社会学对法西斯主义作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第

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甚至每一个人在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

赖希还认为,“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大众产生和拥护的”(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有着广泛的大众基础。这个大众基础主要是中下层阶级。有人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希特勒对大众的欺骗,赖希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这种组织大众的成功应归因于大众,而不是希特勒。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总之,应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承担责任的是大众,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在大众的性格结构之中。

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又称心理结构,是指人们行动和反应的综合方式,与通常静态心理学或道德学的性格概念有所不同。赖希把自己的精神分析技术叫做性格分析(character analysis),并自认这是对传统精神分析学的症状分析的一种改进。

赖希认为,人的性格结构分三个层次,这些层次都是社会发展的沉淀物。第一个层次是表层,表现为含蓄、彬彬有礼、有同情心、负责任、讲道德,但都是虚伪的;第二个层次是中层,表现为残忍、虐待狂、好色、贪婪、嫉妒,这是人的“第二动力”,是对原始生物欲望压抑的副产品;第三个层次是深层,又叫“生物核心”,表现为诚实、勤奋、爱合作、与人为善。深层性格是人的自然的健康的基础,产生着自然的里比多冲动,但里比多冲动在经过第二个层次时便被扭曲为反常的。

性格结构的三个层次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分别有自己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体现着表层并为之辩护,但由于不了解深层,也就无法克服中层;真正的革命、艺术和科学是出自深层的,但由于没掌握入民大众,迄今为止在实践中也是无力的;法西斯主义体现的是中层,即被扭曲的反常的性格层次。反常的性格层次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小人精神,即既渴望权威又希望造反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典型的下中层人士的性格。城市下中层阶

级在经济上是贫困的,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心理结构不相一致,他们不仅没有产生革命的意识,反而按统治阶级的样式重新塑造了自己人格,表面上装出一副绅士派头,心理上以权威自居。农村中下层阶级的生产方式则直接要求他们结成严格的家庭纽带,这种纽带的前提就是性压抑及由此产生的性道德。

赖希认为,这种性格结构不是人天生固有的,而是几千年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文明的反映,是社会条件逐渐影响的结果,特别是性压抑的结果。他一再指出:“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

在弗洛伊德主义者中间,赖希是最强调性的作用的。他非常看重弗洛伊德关于性能量(里比多)是心理生活的原动力、童年被压抑的性力量后来必以病态表现出来的思想,并着眼于社会条件来考察性压抑的产生及其后果。他认为,性压抑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在母权制时期就不存在性压抑,只存在性生活的自然的自我调节。但是,随着权威主义父权制和阶级分化的产生,性压抑开始表现出来,性兴趣开始服务于少数人的物质利益,自然的性活动和道德便发生了冲突。性压抑产生的性犯罪感扼制了性能量,使得性能量以各种病态的方式爆发出来。用赖希的话说,“由后来的母权制的革命过程而产生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性秩序,由于剥夺了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性自由,使性成为商品并使性利益服从于经济,它便成了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基础。从这时起,性生活便被扭曲了,成了必须受到约束的魔鬼似的凶残的东西”。被扭曲的性生活反过来又加强了父权制和阶级分化。

性压抑和权威主义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性压抑是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基础。“性禁锢和性衰弱构成了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下中层阶级人士的结构形态的最根本的基础。”也就是说,权威主义家庭是靠性压抑来维系的。另一方面,权威主义家庭又是实行性压抑的最重要场所。“权威主义社会反对儿童和青少年性活动的斗争……发生在权威主义家庭的框

架内,家庭已被证明是成功地进行这种斗争的最好制度。”家庭的作用在于塑造儿童将来适应权威主义社会的性格结构和意识形态。

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是性生活的残酷化。性由于得不到自然的满足,便寻求替代性的满足,于是自然的攻击性就成了野蛮的虐待狂,这是导致法西斯主义分子种种残暴行为的根源。另一方面是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情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

法西斯主义故意利用性压抑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在意识形态上,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在性上和经济上患了不治之症的社会对绝对革命的性自由和经济自由趋势的抵制,它以极度的恐怖把关于抵制这种自由的思想逐渐灌输给了反动者。”所以,法西斯主义把自然的性活动视为颓废、淫荡、纵欲,把“性革命”说成是堕落,反对种族杂交,宣扬“种族纯洁”,鼓吹性道德。而在法西斯主义者这些言行背后掩盖着的却是他们的“性高潮焦虑”(orgasm anxiety),即因本能的满足在外部受挫而引起的、并由于内心害怕被抑制的性激动而固定下来的性焦虑。所以赖希说,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是性高潮无能的人的性格结构的纯粹生物病态表现”(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这里所说的“性高潮无能”(orgastic impotence)是指缺乏性高潮的力量,即在性交顶点时不能完全释放性激动。赖希认为这是今天普通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各种生物病态症状和社会非理性主义的能源。这里所说的“生物病态”(biopathy)是指生物机体由于生物脉动的失调而引起的紊乱,包括在自主的生命机制中发生的一切疾病过程,其核心是在释放生物性激动时的失调。总之,赖希使用这些术语旨在说明法西斯主义分子都是性无能的病态的人。

在赖希看来,“政治反动势力的文化政治的核心是性问题。相应地,革命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也应当是性问题”。性经济的概念在